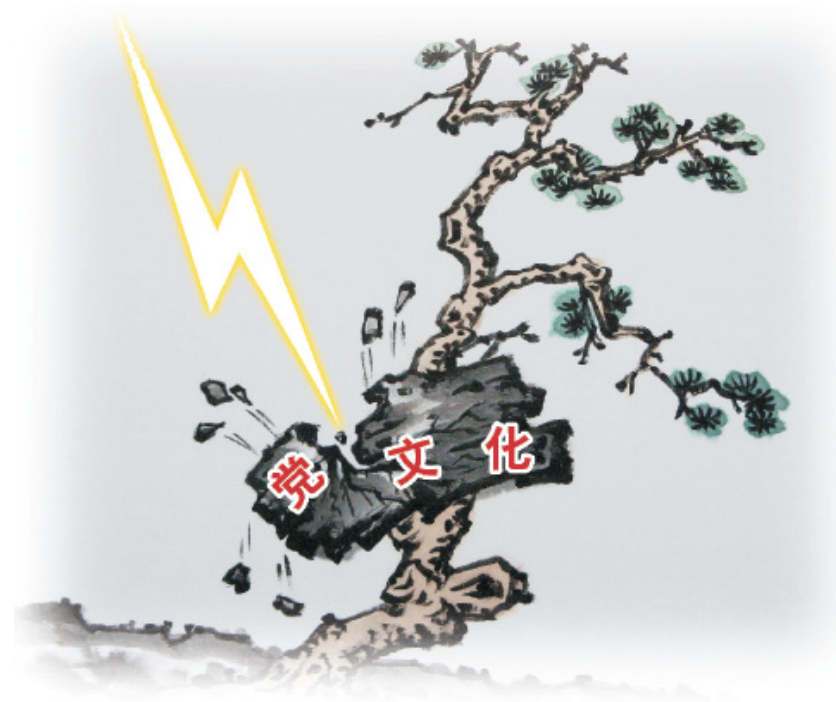


# 解体党文化

## (上)

绪 论	3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5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15
第三章：灌输手段	45



## 公告：大纪元将发表《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

中共的历史是谎言与暴行交织的历史，而其谎言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在于对事实本身的掩盖或歪曲；第二个层面，则在于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的所有社会资源而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即开始耳濡目染。

久而久之，人们一方面对事实无从了解，另一方面却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其行为，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由此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党文化，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其结果就是让中共在党文化环境中苟延残喘，继续为恶。同时在党文化作用下，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人类状态，直接危害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传承性。鉴于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解体党文化，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为祸中国人，就变得尤为迫切。

党文化具有庞杂的生态系统的某些特征，其表现为一定的“容错”性、“自适应”性甚至“自我繁殖”性。一个或许多物种的灭亡常常不会导致一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党文化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观念、语言和行为方式背后都有各种谎言、逻辑陷阱、似是而非的价值标准等因素的支撑。这些因素交织起来，互相配合形成了党文化体系。一旦某一部分被揭穿，其它的部分就会自动补充，继续支撑着党文化系统的存活。因此彻底破除党文化，需要系统的论述、剖析和反思。

大纪元编辑部从党文化的形成历史、成因、表现、危害，以及中华正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从今日起推出特别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以期被中共蹂躏85年的中华民族，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平顺过渡到一个自由而昌盛的新纪元。

《解体党文化》系列文章包括：

上篇：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灌输手段

第四章：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

第一章：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第二章：习惯了的党话

第三章：生活中的党文化

第四章：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什么以改变现状，可往往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这种矛盾心理就会使他十分痛苦。在中共的恩威并施下，为了自我保全和心理平衡，人们只好从真相退却，主动把自己闭锁在中共的谎言圈套里。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不是看不破中共的谎言，也不是没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是不敢接受真相，毋宁相信中共的谎言，配合中共欺骗自己的良心，来换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和良心的虚假安稳。

第三，党文化是一种附体文化，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具有民族文化的某些表面形式。上文已经探讨过，党文化是如何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增加欺骗性、增强宣传效果的。附体的另外一个效果是，当中共的罪恶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中共可以方便地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传统文化上，比如让所谓“封建遗毒”为文化大革命负责。这就好象张三杀死了李四，然后披着李四的衣服去犯罪，结果人们误以为做坏事的是李四，于是把李四掘坟鞭尸，却让真正的坏人逍遥法外。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中共的灌输以暴力手段做后盾，它的所谓思想改造不仅仅改造思想，很多时候，它还会去改造人的肉体（批斗、劳改、判刑、直至杀害）；第二，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中共统治下，要想出人头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对中共俯首听命，因此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网罗来为其统治服务；第三，中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在是半封闭），人们无从获得完备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进“革命的大熔炉”里，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马列毛那一套制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显得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比如斗争的观念就是经过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残酷斗争建立起来的，斗争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斗争哲学也好像是对的。

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人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思想感情。共产党劫持整个国家的力量，千方百计扼杀人先天的纯真善良，向人们灌输变异邪恶的思想情感。如果把一个人的思想比作一个瓶子的话，那么瓶子的性质取决于其内容：灌进去蜂蜜就是一瓶蜂蜜，灌进去毒药就是一瓶毒药。每个中国人都不妨反思一下：在人生重大问题上，决定你的选择的，是自己的本性，还是被中共灌输的观念？那些邪党灌输的观念将把你带向什么样的未来？

常言道，“故土难离”。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会对那个环境产生一种眷恋。同理，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的人们，对这种文化也会产生一种精神依附和感情依附。当我们指出这种文化的虚假和邪恶，并且开始清除它的时候，有人甚至觉得怅然若失。

可是，党文化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人文环境。今天，当我们看清了中共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看到了中共正在把整个民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能不悚然惊觉，继而叩问自己的良知：是什么样的弱点使我们容忍了中共在中国的肆虐？现在的情形还允许我们继续容忍下去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反思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我们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

大纪元编辑部  
2006年9月9日

道人心的作用，讲究用理性节制情欲，用艺术辅助和谐的人生。

中共的理论宣传和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样板戏的原则是“三突出”；塑造人物要“高、大、全”；革命歌曲的风格是“高、快、响”，犹嫌不够，在歌谱上还要加上“豪迈地”、“激昂地”、“意气风发地”等风格提示。就象总喝烈性酒的人，无法体味茶的隽永；听惯了重金属摇滚乐的耳朵，很难欣赏优雅的古琴曲，习惯了中共艺术的人们，也失去了对艺术的正常品味，以为中共艺术里那种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是人类艺术的常态，殊不知那恰恰是人的魔性的体现。

另外一个例子是颜色的运用。红色是血的颜色。在传统艺术里或在生活里，红色只能作为点缀，不能够大面积使用，因为它会使别的颜色都显不出来。可是在中共的舞台艺术里，红色的服装、红色的布景、红旗、红灯笼、红道具，整个舞台一片红彤彤。其实，中共在激发、诱导人的魔性，在使人适应这种魔性的状态。

这种不理性的状态是中共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条件。中共虽然现在不提“不断革命”的理论了，但它的本质决定了它从斗争中吸取能量，把革命当成常态，拿运动当饭吃，把穷折腾当日子过，一旦遇到危机，首先想到的是制造一个敌人，再煽动人们和这个假想敌斗争。如果中国人都平和理性地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没人跟中共瞎跑，中共就没戏可唱了。由此可见，让观众心血冲头、激情澎湃，是党文艺的重要职能之一。

以上简单分析了中共利用多种艺术形式灌输党文化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举一反三，自己举出大量的例子。

##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灌输党文化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系统性、伪善性等特点。让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中共灌输手段的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党文化是一个由中共在总体上掌控的自我调适系统，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也具有自我调适的特征。中共只要政权在握，设定极少的初始条件，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自动生成出来。

毛泽东在 1964 年说过一段话：“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中共的文艺理论书可谓汗牛塞屋，哪本书也没有这段话说得透彻：谁不听话不给谁饭吃。中共掌握了一切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都必须俯首听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编在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党”并不需要自己动手制造党文化，党只要决定“坚持某某，反对某某”，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同理，每次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动，中共不得不调整政策时，只需对宣传部门发布一些简单的指令，宣传部门就可以“创造性”地实现长官的意图。高等院校的传播学院、新闻学院、艺术学院等，更是可以大批量制造出“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列主义舆论学”、“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等等，为中宣部支招和辩护。

第二，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是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对顺从的人中共动辄施以小恩小惠，可是对于那些思想独立、不愿与“党”保持一致的人，中共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共统治下，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无产阶级铁拳”的巨大威胁，因此如果听信和中共宣传口径不同的话，就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接受了真相，一定会想做点

## 绪 论

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 1949 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 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

乎离我们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共产党培植的邪恶审美心理有多么不易了。

#### （4）利用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简单地讲，就是爱屋及乌，因为喜爱欣赏事物甲，连带着也喜爱欣赏事物乙丙丁。商业广告经常请娱乐明星推荐某个品牌的商品，追星族们因为崇拜该明星，对他/她推荐的商品也不加别择地接受，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季野鸭和菱藕，秋收满舫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中华大地的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是被破坏的关系。可是这么一唱，毫无逻辑关系的两件事物之间被强行扯上了关系，人们因为热爱祖国的自然风物，好象也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和感恩情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 （5）相声、曲艺、小品的独特作用

中共发动政治运动不是从摆事实、讲道理开始（因为如果能够摆出事实、讲出道理的话，它也就不需要发动政治运动了），而是往往首先进行人身攻击，用粗鄙的想象编造迎合人的阴暗心理的妖魔化故事，从而达到挑起仇恨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栽赃法，十分有效，屡试不爽。

比如文革时，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是中共散布谣言，说刘的老婆王光美为了自己的皮肤好用牛奶洗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喝上牛奶都是了不得的，而刘少奇的家属用牛奶洗澡！于是人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就可以对他切齿痛恨、鄙夷不屑了。

基于同样的道理，戏曲、相声和小品等文艺形式在贬低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打击中共的敌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很多相声都是讲破除“封建迷信”的，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和风俗都在被讽刺挖苦之列，比如婚俗、阴阳的观念、宗教信仰等。很多人都会记得，在一个流传极广的相声里，一位老太太请来一尊神像，邻家的小伙子问：“您是多少钱买的？”老太太教训他：“不能用买，要说请。”小伙子改口说，“那您是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心疼地说，“噫，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善男信女被丑化为庸俗功利的愚夫愚妇。

2001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小品《卖拐》，就是间接地诽谤法轮功的。小品演出后，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借机打击法轮功。比如《检查日报》上《从春节晚会小品〈卖拐〉看“法轮功”伎俩》，《云南日报》评论春晚，中间提到《卖拐》，说“鞭笞法轮功，表演很到位”，被大量转载的网络文章《由赵本山〈卖拐〉看心理暗示》也落脚到揭批法轮功上。

这种手法的危害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事物或观点是错的，而是把它荒诞化、漫画化，使人根本没有机会去理智思考这一事物的是非对错。被抹黑者的辩白被淹没在观众的哄堂大笑之中。

#### （6）中共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

孔子曾说过，“郑声淫。”意思是说，郑这个地方的音乐，溢出了人的情志以外，是一种夸张虚伪的艺术，对人的道德有负面影响。中国古人重视艺术对世

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样板戏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样板戏从创作到演出集中了当时戏剧界最优秀的人才，在技术上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是，样板戏大肆篡改历史、渲染暴力、歌颂仇恨、颠覆传统价值观、对中共领袖和所谓“英雄人物”进行无限神化和吹捧，这一切都说明它们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服务。那么，其技术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后，样板戏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可是，听惯了样板戏的八亿人民为样板戏的复活提供了土壤。时至今日，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某些样板戏被吹捧为“经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编成电视剧公开放映。可见样板戏的阴魂不散，样板戏灌输的党文化也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样板戏这种宣传方式，非常简单粗陋，人人都能一眼识破，因此不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中共的宣传也是量体裁衣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都相对简单，也许绝大部分人都能意识到杨子荣、阿庆嫂、李玉和、柯湘等人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夸张，但却多半不会想到，他们反映的，是完全颠倒、扭曲了的历史。

文革以后，戏曲人才和戏曲观众纷纷老去。随着新的媒体形式和审美习惯的兴起，戏曲逐渐被边缘化，中共宣传部门对戏曲也不再象以往那么重视了。

### （3）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

人的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形成或者改变一种审美习惯，往往比形成或者改变一种理性思维更加困难。因此，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虽然似乎见效比较慢，不象杀人、搞政治运动那样能够立竿见影地制造出恐怖气氛，也不象舆论宣传那样能够迅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文艺宣传诉诸人的感情，培养一种独特的审美习惯，入人心深、危害隐蔽而持久。

2004年“七一”之前，中共在全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红色经典”演出，节目包括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及歌舞等。据说“很受群众欢迎”，“票房很好”。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作品曾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年代，我们是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走过来的，在七一这样特殊的日子，重看这样的经典歌剧让我似乎回到从前。”

这位观众也许并没有说假话。可是，艺术和审美并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在共产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大量的歌曲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色彩，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党”那么热衷于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办“歌咏比赛”和“文艺汇演”。

过去的人们一张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烽烟滚滚唱英雄”、“一条大河波浪宽”，现在则是“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东方红》、《歌唱祖国》、《长征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些歌大多运用民歌风格，曲调优美上口，使人百唱不厌。对领袖的忠诚、对“党”的热爱，就在人们摇头晃脑之际被悄悄压进了他们的潜意识。就灌输党文化的效果而言，这些歌曲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四卷《毛选》。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只要想一想改变自己的饮食口味多么困难，就知道清除

## 第一章 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華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起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 1. 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 1918 年 4 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 1999 年 11 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

## （1）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歌”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体现吗？其实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哟我的三哥哥。”

1943 年，这首陕北高原上传唱数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东方红》，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换成了东方、太阳和毛泽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成为党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类似的“借尸还魂”的例子数不胜数，比较有名的有把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白毛仙姑变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原来是讽刺忘恩负义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把刘三姐变成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编历史剧”利用古人的嘴，宣扬中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如《逼上梁山》，林冲“从恨高俅个人到恨整个剥削阶级”：“要把这世界翻转了，那须得枪对枪来刀对刀。”

经过三十年的文化灭绝运动、把优秀民族文化破坏殆尽以后，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称：它代表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同时更加肆无忌惮地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党文化的邪恶货色。它所以敢更加肆无忌惮，是因为世界还不了解中国，人民多忘记了传统。失去了敬神向善内涵的伪飞天、伪千手观音和伪民歌民乐，伴着邪党文人花言巧语、似是而非的诠释，给中共的黑暗统治装饰了一道华丽的花边，同时更隐蔽、更彻底地摧毁人们对神佛的正信、变异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品味。

## （2）八亿人八个样板戏

传统戏曲对忠孝节义等美好情操进行形象化解说，对于维系社会的道德水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对所谓“封建礼教”横加批判，传统戏曲也被大加挞伐。鲁迅在论及戏曲改革时说：“（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戏曲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整体，是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动，也就不是戏曲了。

1949 年以后，中共“改制、改人、改戏”，戏曲界被摧残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因果报应被批判，只有经过改编、能够承载起中共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的戏剧，才被允许存在。剧作家吴祖光愤而指出，中共“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样板戏”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样板戏一般是指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京剧和舞剧，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创作出来了。在江青直接指挥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指导原则，把这些戏剧改造提纯，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需要。文革中，绝大部分电影和戏曲作品被作为毒草禁映禁演，样板戏和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几乎是仅有的合法文艺形式。十年中它们反复上演、播出，强制性地让群众收听观看。今

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 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 2.5 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公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八十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在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集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

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审美风格元素，渗透于一切影视作品之中，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巩固党文化对人心灵的桎梏。

与其他艺术式样相比，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美术、音乐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电影必须全面表现故事发生时的物质环境。因此电影画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经过精心布置，使它们能再现故事发生年代的典型环境。比如，表现文革时期的环境，要有毛像、大字报、绿军装、红宝书等。1949 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要想表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环境，只能使用带有浓重党文化色彩的物品、声音和场面。这些场景往往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使观众觉得虽然那个时代有很多缺点，但毕竟自己曾经拼搏过一回，就象普希金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谬，但人们那时还年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充满说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会招致反感，所以这种“顺手捎带”的方式，就成了影视作品在客观上帮助中共灌输党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勾起人怀旧情绪的电影元素往往是电影要表现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这些符号携带的信息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警戒心理，畅通无阻地进入观众的头脑之中。

影视（《激情燃烧的岁月》）、歌舞、文学、时尚、甚至广告（北京中关村曾经有一个巨型广告，仿照文革宣传画风格，上书“Internet 就一定要实现”）、旅游（“红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这个“怀旧情绪”的大合奏，其实都是在帮助中共巩固党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桎梏。

## 2) 利用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中共的文艺宣传形式，很多是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因为灌输党文化的对象是所有中国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资源，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输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剧、话剧、评剧、豫剧、吕剧、越剧、粤剧、秦腔、秧歌、黄梅戏、花鼓戏、二人转、京韵大鼓、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相声、评书，中共无所不盗，党文化附体在这些传统文艺形式上，流毒可谓广而且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

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

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 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这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 2. 宣传唯物论

无神论作为党文化的基础，摧毁了人们对神的正信，而让中共能够为所欲为。但是，中共还要走得更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文化的另一块基石，被唯物论洗脑的中国民众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产党却把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地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到此，这个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

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更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正好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现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 100 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政策之下，成了彻底的“唯利主义”者。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都是共产党。中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彻底颠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监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恶道德等价值评判，从超越人类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剥夺，而完全成为世俗权力的一部分，再随着世俗权力的堕落和声名扫地，最后完成了以个人利益来判断善恶好坏的价值观转变。

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 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 年到 1992 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 （2）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 25% 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 是娱乐片，5% 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象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样子，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象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象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公的“高尚道德”



## 1) 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 (1) “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

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地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两段切中时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战时特别状态所作的批判。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怎么反而成为障碍了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讲究“物质决定意识”的中共,从来都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看得比农业部门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中共却一再犯着“唯意志论”的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彭德怀因认为这些口号“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不符合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毛泽东将其打为“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这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对民主的讲述,都被置于共产党的另一大理论系统中,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说成是“黑”。白马非马,灰白非白的游戏充斥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并且被大多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的独裁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成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总之，在附加了前缀之后，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词的定义。这类被“辩证”过的荒谬概念过去在中国大陆泛滥，今天仍然在继续发生。

### 3. 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的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借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分子无论做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现在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用这个技巧编造的。小学生不需要喊“四个伟大”了，却要“和‘乡亲们’深情地回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现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留学生海外漂流遇险，想拿大衣换一块面包，老板（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学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老板眼里闪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换红旗。留学生大义凛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课宣讲“一个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语文课则从台湾没有雪讲起，最后用老师的话点题：“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着你们去和他们一起玩呢！”

这套新近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二册开始，系统灌输“红领巾”、“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用故事讲述中共的台湾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思想单纯的少年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党文化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本加入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仍然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党魁文章仍然占据一定篇幅。第二，与众多文学名篇并置在一起，党文化篇目也自然获得了文学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经典化”了。当学生用这些党文化篇目学习文法和修辞的时候，已经把内容当成自然、当然、甚至必然的东西，毫无戒备地吸收了。第三，目前应试教育中的技术至上化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无谓的细节，对文章内容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探究。

当然，语文课是和其他课程配合发生作用的，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表明党文化的强大吸纳力和高度欺骗性。就象“人权入宪”、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高呼“和谐社会”一样，没准儿哪一天，“坚持发扬儒释道国粹”也会写入党章和宪法，继续为“伟光正”和“与时俱进”提供注脚。

中共教育体制下的其他课程，象地理、音乐、自然科学等等，都同样担负着灌输党文化的使命。窥一斑可见全豹，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中国自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对教育普遍非常重视。对于为数众多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大学更是除参军以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唯一途径。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国家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的教育。几十年来，中共把本来应是天下公器的教育变成贩售自家私货的作坊，一代代中国人被迫吞咽下党文化教育的苦果。

### 5. 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 3) 语文课：寓骗于乐

#### (1) 课文的选择

在给学生灌输党文化方面，如果说政治课唱的是白脸，那语文课唱的就是红脸。政治课是疾风暴雨地灌，语文课是春风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选择，很有学问。中共党魁的文章或关于他们的文章要占到一定比例，中共的所谓“英雄人物”（王二小、刘胡兰、江姐、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也不能缺席。为了图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语文课要正面表现古今中外的被压迫阶级，再把几个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周扒皮等）点缀其间。关于西方国家的课文，要体现出“资本主义糟粕”的特点。小音乐家扬科、万卡、我的叔叔于勒……或者悲惨地死去，或者黯淡地收场。世界名著不得不选，但要选与中共教条合拍的。因为毛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读《红楼梦》，所以中学教材要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以显示封建统治阶级自私残暴，草菅人命。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毛说：“反对自由主义”，鲁迅说，五千年历史，满本写着两个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这些篇章，很多部分都要背诵。

#### (2) 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 (3) 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 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 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 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 1991 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 (4) 新近的趋势

曾几何时，小学生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的课本“进步”多了，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册才羞答答地推出“邓小平爷爷植树”。杜甫的名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是直接写诗人对孩子的想念，反而说小孩子还不懂得想念父亲，角度新颖、情味隽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为本，孔子主张“仁”与“信”。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 1987 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唯物主义对于精神领域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其中“美”就是一个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阳下的晚景，在唯物主义中只能被分析成为电磁波的不同光谱；爱情，被归结为人类自身荷尔蒙的变化；人类的高贵情操，则被理解成琐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党员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 180 度的大转弯，变成鼓励“纵欲主义”。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红灯记》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

#### 4. 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在确立了无神论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的理论基石之后，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党文化的体系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民众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共产党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填补这个真空。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画“神”点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乘国难当头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请示、晚汇报”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是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共产党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一切与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一个 2004 年春出笼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这样写道：

“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看来，中共真的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 2) 历史课：自欺欺人

(1) 政治挂帅，历史就象政治的分支学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世界各大文明国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为个人的立身处世和民族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一个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象一个失忆的人一样，处境是十分可悲的。

可是，中共的历史并不光彩，真实的历史是共产党的天敌。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必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御用学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把中国历史嵌入虚幻的“发展五阶段”，得出“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通读中共的中国史教材，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政党出现，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一盼就是两千年。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党来了。

事实真相是，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是纯粹的虚构，跟中国历史更是完全对不上号。如果说，中国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制，那怎么解释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孔子说“吾从周”，汲汲奔走于六国之间，要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中共眼里，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反而成了“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谎编大了就难以说圆。这套体系被戳得体无完肤，中共只恨当年不曾把二十五史烧掉。

(2) 掩盖、篡改、断章取义，把真实历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门编历史教材的指导原则是：“唯物史观”解释不了的一概不讲；共产党的丑事恶行一概不讲；历史上的圣贤君子、明君贤相要挑着讲，讲的时候一定要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反动阶级的罪恶”要大讲特讲；“农民起义”要大讲特讲；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要大讲特讲。

中共的历史书也讲孟子，讲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显示其“剥削阶级”的本性；讲国民党要污蔑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却从来不敢说真抗日的恰恰是国民政府，中共自己“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讲基督教不讲“爱人如己”的教化，要强调“宗教战争”和“宗教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讲资本主义国家要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意识到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了解历史真相，可是由于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套中共的邪恶史观，很难有根本上的突破。在近现代方面，中共垄断史料、封锁言路，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后的真正历史。由于中共对历史的系统篡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体事件编造的谎话，更要有能力从中共的理论框架里跳出来，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产邪灵祸乱人间的近一个世纪。在这方面，《九评共产党》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称为“原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称为“基础”，好象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这一套东西。毫无抵御能力的青少年学生完整地把这一套虚假而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接受下来，从此变得狭隘而偏执，以为所有正常人都这么思考问题的，而共产中国才是世界的样板，动辄贬斥不同观点为“反动”、“沉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学生学完社会发展史，问老师，“既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那资本家不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

大学的哲学史以马克思划线，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被称为古典哲学，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总之尚未发现真理；马克思以后的被称为现代哲学，全部带着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气息。中国的传统思想，如果还有一点合理成分，那也是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先民们“天才地猜测”到的。各种《哲学史参考资料》一类的书，按照这种结论阉割史料，把丰富的历史剪裁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了这样的哲学，让人似乎觉得“天不生马列，万古如长夜”，令人纳闷既然马恩列斯毛一劳永逸地发现了真理，为何不把其他的书一把火烧掉。

###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学内容——时事政治

中共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党，其立场原则不断变化，即使那些善于紧跟形势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应该对某一件事新近发生的事情持什么态度。“时事政治”教育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试中，总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试题是关于时事政治内容的，强迫学生按照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解释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诋毁法轮功的选择题。

### （4）灌输仇恨和歪理，培养愤青和政治冷漠

人权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可是经过多年灌输，“人权”这个词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个贬义词，至少是一个可疑的词。听到这个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说话的人没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没有辨别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贯“从娃娃抓起”。1999年以后，灌输对法轮功的仇恨的内容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中、小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中三年级“思想政治”教材的第四课里，赫然印着诽谤法轮功的“教学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小学《思想品德》（第十册）十二课中，不但专门假借刘思影之口使大陆小学生落入“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的仇恨，而且让所有小学生把诽谤与仇恨法轮功当成“理所当然”的正面思想行为。很多家长虽然自己对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以为然，但为了保护孩子的纯真，不跟孩子谈有关话题。不料家长的好心却恰恰使孩子毫无保护地陷入中共的一言堂宣传之中。

除了前面引用的直接灌输某一结论的题目外，政治考试里还有一类题，必须扭曲自己的思维，才能给出正确答案。难怪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长期训练以后，学生们学会了“悬搁”自己的正常逻辑思维，进入出题者的变异论理方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完全习得这套邪恶论理方式，成为“左棍”、“愤青”，或者彻底放弃理解这些推理的努力，满足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这些学生答题可以毫不含糊，但从此对“哲学”、“人生观”、“政治”等产生深刻的厌恶和冷漠，最终成为只关心一己私利而毫无公共意识的个人。

### （5）政治课绝不放松

近年来，中共教育部对某些科目教材编写的控制慢慢松动。但对于政治课，却绝不放松。据说，“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

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给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18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象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〇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



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信神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

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操纵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分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

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制订法规、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通过组织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用教科书给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取得政权以后，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在非运动时期，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吞噬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饶是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19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这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分。

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恶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中共是怎么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

## 1) 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 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涵着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除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中共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教学目的不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

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概括的说法，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课时之长，课程之多，要求之严，古今中外仅见。

在不同的阶段，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小学时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会发展史”、“国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养”、“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形势任务”，大学里叫“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法律常识”等等。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课、核心课，列入各级考试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学考试里，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录取。

(2) 把党文化装扮成“德育”、“常识”、“原理”、“基础”

党文化是无中生有的骗人的玩意儿，可是要想让人无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衡之古今无不通”。于是，反人性的阶级仇恨教育被称为“德育”，反常识被称为“常识”，歪理被

## 第二章 系统的思想改造

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驭繁,不为各种假相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巅峰时,它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它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我由我去画个句号吧?”(《亮剑》)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利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

### 4. 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1949年以后,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 1. 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维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

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

(3) 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地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乘虚而入。

(4) 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瘾好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象搔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瘾好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这一点。“党”的教条被包装成一句口号、一首歌、一幅画、一个比喻、一个形象，而后被用各种方式不断重复加强，硬生生给中国人制造出一种变异的“美感”。被称为“山大王的诗”的“毛诗词”、粗野不文的“毛文体”、飞扬跋扈的“毛体书法”被重复、模仿、崇拜，有人还以为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顶峰。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培植的民众对其邪恶文艺的心理依赖仍然没有失效。

4) 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

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 1949 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拼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划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得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学上一般把二十五岁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二十九年。192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前 30 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 1978 年的时候已经 60 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长大的；换句话说，到 1970 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

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待“党”的直接领导，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伟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

#### （4）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得“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姐儿（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

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

### 3）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

#### （1）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决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各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

#### （2）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嫉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嫉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 （2）批判知识分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分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分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不认同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分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分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



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作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电影《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分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表现主人公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分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分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分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地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分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知识分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代，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玷污了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象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 （2）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

## （3）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共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富庶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

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

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 1) 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殤》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 2) 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方式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铁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这样面对死于矿难的矿工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污染严重的知识分子，虽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苦无报国安民之路，无奈中只能争取“体制内”身份，要求“体制内改革”，凡事寻求“体制内解决”。“体制内解决”无非是首先向共产党称臣，承认共产党和党文化对自己的控制权和任意使用权，进而取得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在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一些浸泡在苏联文学和共产党著作中长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药，难以放弃对共产党的理想心结，为社会不公呐喊之余，却无法帮助人们弄清中共才是万恶之源。这些人对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实乃用个人的德行遮盖中共的丑陋，延缓行将就木的中共寿命。

###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认为云中龙。今天的西方学界对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备至。“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道德经》中的箴言至今影响力长盛不衰。自汉代以降，道家符箓、丹鼎等各个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张道陵、邱弘济、许旌阳、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飞升的神迹。历代帝王常以道士为国师，张良即称自己“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余者如蜀汉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风，宋代苗光义，明朝刘伯温等都被开国帝王待以国师之礼。成吉思汗晚年也不远万里请长春子丘处机前去讲道。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后开功开悟，洞彻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轮回。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二十八代弟子达摩一根芦苇渡江，非常人所能为之，后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将身影印在石上，成为千古奇观。禅宗六祖慧能圆寂迄今 1000 多年，肉身不腐，其肉身像至今仍然端坐于广东南华寺中。

中共一方面进行社会发展史宣传，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个宗教内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创始者的言论。佛教认为佛是天国世界的创造者，如极乐世界即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 1965 年在见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时候却说“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与此类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会的主席吴耀宗也称耶稣的神迹都被自己“扬弃”了，并说“上帝已将人类得救之钥匙，从教会手里夺去，交予共产党了。”

神佛为宗教之本。无论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终是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国世界，如佛教净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国世界，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修炼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宗教这个修炼团体也就会瓦解。

中共作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将宗教描述为“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虚幻的反映”，“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

望”。基于这种宣传，一切有关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的教义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对象。

中共宣传“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并刻意将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难、万念俱灰的人入教当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态。

事实上，道家的张道陵（即张天师）曾三次被汉和帝征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为正一品官），张道陵都没有答应，而是隐居在鹤鸣山中修炼。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头造了一座大花园，修筑壮丽宏伟的宫殿，令几百美丽的宫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并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输陀罗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骑马跨越城墙，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后，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罗柰国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国宣说佛法，有王族豪贵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随佛出家。因此，出家绝非对现实苦难（感情失意，或经济困难等）的逃避，而是发菩提心，以慧剑斩断尘缘的大愿。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民间有一个信神的环境。释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称为“法师”、“道长”、“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征，也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即使是传统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给予礼遇和尊重。

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就在民间强行推广“社会发展史”教育，破坏信神环境，将修行者描绘为愚昧、无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敛财等形象。此时，修行者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被尊重者变为大众嘲弄的对象。许多出家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落差而还俗。

“人往高处走”，每个人内心都潜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誉，希望与成功者为伍。中共将佛、道教徒描绘成一个失败者、甚至是“剥削阶级”，将信奉神佛的人描述为迷信和思想落后，这都会使民众与信徒保持距离。

### （2）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继续精进修行，那么接下来中共就要断修行者的粮道了。

一般来说，修行者的资粮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众的供养，二为庙产土地的收入。当中共破坏民间信神环境时，第一个来源就中断了。对第二个来源，中共的对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 1950 年 1 月颁布的《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寺庙、教堂等土地一律收为国有。各地寺庙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僧尼，转而从事农、林、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到麻袋厂、织布工厂、印刷厂、比丘尼缝纫组等处工作。

依照佛教传统，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为生，并不从事生产。传入中国后，禅宗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因为住地远离城郭，乞食困难，于是自耕自给，以农养禅。道信教诫门人，“努力勤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并非目的，仅仅是为能打坐参禅而从事的糊口劳动，且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要闭门打坐。

由于中共对生产资料和商业行为的全面垄断，寺院道观的生产性质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农养禅，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单位，并被置于共产党的经济控制之下，仰共产党鼻息而生存。经济上对政权的依附，结束了宗教的独立性，并进而在政治上成了共产党的附庸。这是对宗教传统最大的破坏。

### （3）消灭肉体

1955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

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分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分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 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

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固然无法解释现实，但是从林昭、遇罗克到张志新，跟共产党较真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好下场，人们对此记忆犹新，思之仍然不寒而栗。于是，被运动惯了的人们不再较真，“认认真真走过场”，见风使舵、麻木苟全。

第四，伴随着每一次政治运动，是共产党的禁书、烧书、毁书，人民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只好阅读被中共允许的少量著作。文化革命爆发以后，中国的印刷厂都在忙着印刷毛语录和毛选，正常的出版印刷几乎全部停工。文革开始的那几年中，中国的出版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量图书被当作“封资修”垃圾、四旧烧毁，图书馆关门，书店也只卖领袖著作。那时的很多家庭，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书籍。很多良心犯、知青、下放右派，都有把《毛选》翻来复去读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的经历。

第五，中共在教育领域里实行政治挂帅，大中小学课本里充斥着马恩列斯毛的文章和为马恩列斯毛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上学，就逃不过中共的洗脑和灌输。很多篇目被要求背诵。青少年记忆力强但缺乏分析能力，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大套共产党的荒谬理论，其中很多观念和思维习惯会左右人一生。

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刻意经营，中共用马恩列斯毛邓江本人的和为数众多的文人的书，在中国布下了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组成这张罗网的是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些概念、判断和推理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天、地、人，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彻底隔绝人和真实世界的接触，彻底代替根植于自然和人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最终制造出对中共邪党惟命是听的无根人。今天，这张大网虽然已经朽烂不堪，但由于人们思维具有一定的惯性，暂时它还在束缚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随着《九评》的传播和党文化的破除，人们终于会迎来彻底冲决网罗的一天。

### 3. 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肉体上消灭，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分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分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

示》，史称“肃反运动”，打着“纯洁佛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 （4）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法”即佛经。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对于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

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了未来的情况，即有魔王转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从内部坏乱佛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和尚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认为三乘共法（天乘、声闻、圆觉）要么属于“迷信神权”、要么属于“消极避世”。“人间佛教”进一步主张“修行现代生活化”和“寺院现代学校化”，“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等等。这种打着“人间佛教”的幌子而将佛教彻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与佛陀原意直接相悖，并不符合佛教几千年来所要求的远离尘世欲望，追求心灵升华与超脱的修行方法。藏传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诉弟子说：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谈度化众生的事业。

如绪论中指出的党文化的第三种类型，中共将已经存在的思潮加以“发扬光大”，并从深度和广度上动用其掌握的国家资源进行推广。

中共认为“人间佛教”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关注“天国”的眼光转移到关注“人间”，那么中共就可以轻易编出更多的谎言，操纵教徒的思想。于是，“人间佛教”的传人，太虚的弟子赵朴初就成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选。

在赵朴初等人的带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时时挂在嘴边。事实上，佛经中提到的“庄严国土”是指庄严佛国净土（如《妙法莲华经》中的诗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利乐有情”是指将“有情众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绝非佛教协会所说的“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

#### （5）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纵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以其代理人占据要津，成为附属中共的类似现在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这些协会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归统战部管辖，在政府体系中归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其目的不是为了繁荣宗教，而是为了控制宗教。

中国佛教协会在其发起书开篇处即热烈讴歌中共镇压反革命，并“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谀词滚滚，与任何一个世俗组织相比都毫不逊色。

释迦佛出世为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悉达王子，出家后又有瓶沙王欲以国王之位相让，悉达太子都没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见，佛教之真意并不在人间的荣华与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纵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其成立章程中确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仿佛。2005年通过的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加强……时事政策的学习，提高道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促进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简单地说，道教协会就是要让《道德经》适应于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变信仰

的内涵。

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释教义。宗教认为世界是苦难的，这种苦难自然是与天国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则就无法解释释迦牟尼为何要放弃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却谎称中共治下的中国“就不能再……说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进一步，为促进信徒更进一步溶入世俗，各协会都在批判所谓“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宗教观念”，让教徒相信建立人间天堂。这种说法与佛陀所说“苦、集、灭、道”的四谛妙法截然相反。

这些宗教协会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积累的资源从内部进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张废除戒律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这种内部的批判要比中共从外部的诋毁有力得多。

#### （6）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是一种伪自由，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简单的说，一个人烧香磕头、忏悔许愿，干什么都行，但是当他的信仰和共产党冲突的时候，他就必须服从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表现为宗教世俗化、宗教团体机关化、宗教场所商业化、宗教领袖政治化或干部化。

在中国，宗教局是政府用来控制宗教的部门。许多寺院的方丈、道观的主持同时也是中共的干部，他们有行政级别，领工资，参加政协会议，甚至配备车辆、电脑，每周进行政治学习。与其他中共干部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穿着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观仅仅是其工作单位而已。

伪宗教自由的另一个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庙宇，组织各种宗教大会，修佛像、印佛经等等，给人中共在极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这些事情却跟真正修行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

《九评之六》写道“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如今中国的禅宗祖庭少林寺已经成为旅游和拍摄电影的场所，少林寺方丈贩卖少林文化，近期决定花费 3.5 亿元人民币将清静佛地变为休闲区，被讽刺为少林寺的“CEO”（企业执行长）。他推崇“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于是开着豪华越野车，乘坐飞机周游世界，策划各种大型表演，每日周旋于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各类社会人士之间。他生活中最多的时间，是用于接待来宾和处理事务。达摩老祖所传的“壁观”修法需要清静的环境，如今荡然无存。

2006 年 8 月，江西省化成禅寺的监寺因为“六四”为天安门死难者举行佛教超度仪式，而被当局威胁、逼迫离开寺庙。桂阳县宗教局何局长对这位监寺说：“你吃、喝、嫖、赌都行，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

伪宗教自由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场所，他们研习的经典被中共歪曲，他们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蚀，这都是中共系统破坏佛、道教的圈套。

伪宗教自由同时让一大批听命于共产党的品行恶劣之人成为寺院、道观的住持以及各级宗教协会的负责人，一方面他们积极配合中共需求在国际上为中共的

第一，利用组织手段，通过“组织生活”、“政治学习”，强迫党团员学习马恩列斯毛邓江的著作和中共文件。曾参加过中共组织的人都知道，中共定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参加这些会议的人被要求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文件，经常被要求写出学习体会、思想汇报上交。

第二，定期的整党整风，强迫党员定期学习马恩列斯毛邓江的书和中共文件，否则就面临着整肃或处分。40 年代的整风，50 年代的反右，60、70 年代的文革，80 年代初的整党整风，80 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刚刚告一段落的“保先”运动，每隔几年或十几年，中共对人的控制力变弱的时候，中共就会来上一回“党性”教育，重新确认“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控制。

2004 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以后，中共意识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200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起“保先运动”，计划从 2005 年 1 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被要求学习文件，重温誓词，重新登记注册，写出长篇的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

虽然 200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总结会吹嘘，保先运动“主题鲜明，领导有力，措施得当，工作扎实，……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可是，干部、党员对保先极其反感，这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人们私下里发牢骚、说怪话、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无可奈何地做官样文章。

重复意识形态高调，虽然讨人嫌，但仍然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64 年，在一次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中共看准了，“抄一遍”、重复一遍，党员和群众就会加深一些对谎言的印象。这些谎言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重复这些谎言和高调，间接地毒害别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性和良知未泯的党员，也可以达到侮辱其人格操守的目的。撒一个谎也是撒谎，妥协一次也是妥协，时间长了，这些人只好放弃对自己人格的坚守，开始随波逐流。中共这么做，同时也是在刻意培养人们的政治厌倦。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中共煽动人们的政治热情，鼓吹“要关心国家大事”，批判政治落后分子，批判“逍遥派”。现在，中共又在暗示人们不要参与政治，否则就要被贴上“搞政治”的标签。每一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制度性地做假、走过场，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政治就是那么黑暗”、“谁去趟那个混水”等心理，于是全民向钱看，人们变得自私、冷漠、世故，怀疑一切，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好人，哪个团体被中共打压，那也是不懂明哲保身，咎由自取。就在这种被刻意制造的政治厌倦中，中共再一次坐稳了江山，继续疯狂掠夺国民的财产，并阴毒地迫害那些还有良知和善念的人们。

第三，马恩列宁的著作数目庞大，不可能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通读这些著作。于是从读马列到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政二十七年，毛著发行了约五、六十亿册），从读《毛选》到读《毛语录》、《老三篇》，原本驳杂的主义越来越变成简单粗暴、荒谬可笑的标语口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出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幕：半夜三更，人们被高音喇叭惊醒，原来是传达“最高指示”；买东西的时候，人们会说：“‘要斗私批修！’这肉多少钱一斤？”售货员则答曰：“‘为人民服务！’一毛八！”时至今日，在中国很多地方，还能看到刷在墙上的毛时代的



社会大局做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它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个人。

**谎言和宣传的出口和出口转内销。**毛泽东曾说，出《参考消息》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报刊上找对它有利的片言只语了。它一方面出口谎言，毒害其他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直接收买境外媒体（中文的和外文的）和作者，替自己粉饰涂抹。中共恶首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二十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为了从四面楚歌中挽回颓势，收买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国有生意的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与其他枪手合作，出版“我们观点的《江传》”。在法轮功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和通讯社抵制不住诱惑，换一种口吻重复新华社的谎言，中共再拿这些谎言去蒙骗中国民众。

**有打有拉，区别对待。**89年以后，中共开始有意拉拢收买知识分子、公务员和军队。除了加薪、默许这些群体拥有某些特权和灰色收入以外，还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以此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效忠。这点有限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小圈子里（如学者沙龙），绝不允许进入大众媒体。这些人获得了一种中共渐渐放松言论管制的虚假印象，因而乐于为中共辩护，中共也乐于让他们的辩护言论进入大众媒体，误导普通民众。

中共的宣传策略还包括：把谎撒到大得离谱的地步，人们从常识和经验出发，无法相信一个政权竟然会如此无耻荒唐，于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们的说法；撒弥天大谎的时候在细节上不厌其详，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心，打消疑问；邀请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登上荧幕，诱导他们说中共想要他们说出的话；为了更好地兜售其货色，在技术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轨”，现场直播、热线电话、深度报导、“民意”调查，……花样翻新，应有尽有。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在这些机构供职的人，即便良知未泯、想要为国为民做一些好事，可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定下来，这支大军就会各尽所能，批量生产各种谎言。中共开动庞大的谎言机器，向中国人民灌输了几十年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这些歪理邪说“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当每一个个体都下意识地用它们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党文化的收获季节就已经到了。

## 2. 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

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同义语，但同其他书籍一样，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仍然可以自由出版、流通和阅读。虽然马列的暴力革命学说受到人们的普遍鄙弃，但学者们仍然把其理论作为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一个流派进行研究。大学鼓励学生进行自由地思考和写作，教授从不规定学生必须信奉什么。在社会上，从保守到激进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竞争，人们的选择多，有比较，心态开放，不会轻易地盲从什么。

马恩列斯毛被人宽容，不意味着他们也会宽容别人。共产党攫取了国家政权以后，把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实行邪教的政教合一，利用暴力和组织手段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灌输邪教教义。几十年来，在中共的思想体系里，马克思集西方文明的大成，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切正统的传统思想，或者被篡改、或者被扭曲、或者干脆被禁绝。马列主义的谬种流传，毒害了一代代的中国人。

那么，中共是怎么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的呢？

伪自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拼命敛财，乃至吃、喝、嫖、赌。例如广州两座寺庙里的和尚到三元里集体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体嫖妓；广东佛教协会的会长、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内开了一个“甘露坊”素食馆，弄了几个妓女模样的人站在寺院门口招揽顾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求神拜佛的传统，但必须指出的是，到寺庙烧香许愿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报应所致，以虔敬忏悔之心许愿未来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弥补，希望神佛给以一时之方便，解脱目前的困境。伪宗教人士则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给寺观布施钱财即可获得保佑，全然不管这些钱是否是偷抢或贪污来的。此时求神拜佛从“忏悔”变成了“花钱收买佛，与佛做交易”。

“贪官拜佛，和尚嫖娼”这种伪宗教自由对正教的破坏力最大，许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为虚伪、敛财和淫乱的场所，这种自发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诋毁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必须强调的是，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是多层面的，包括理论层面的批判；把科学宗教化，用所谓“科学”的大棒对儒释道思想进行批判；收编宗教界，在宗教内部对儒释道进行批判；在党内进行思想清理；对儒释道进行妖魔化。这种批判是长时间的持续批判，贯穿在教育、生活中，辅以定期的政治运动强化，人人写文章，或抄文章，强行洗脑。同时，这种批判也是全面否定式的，没有任何可以让人们对传统思想进行保留的余地。在中共狂热的无神论、唯物论意识形态宣传中，在恶毒的对儒释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胁中，在中共险恶地安排代理人从内部进行颠覆中，中共完成了对儒释道的系统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儒释道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让人们条件反射式的避而远之。口号式批判即可，无需证明。

## 2. 批判传统观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睦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

中国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并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代代相传。

而共产党就“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骤。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统的通过“社会发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脑，把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愚昧”，把传统社会描绘成“腐朽、没落”的“旧社会”，把传统观念中的信仰部分标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标为“吃人的礼教”。这样，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强的愿望，中共在全社会发动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打着所谓“移风易俗”的口号，杜绝一切与传统信仰相关的民间活动；同时中共还把传统观念批为替“封建统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把传统社会秩序批判成压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呼应的，把根除传统文化的运动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监督”、“检举”、“揭发”民间仍然保持传统观念的言语和行为，达到彻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试举数例被中共批判的传统观念。

### 1) 批判对天的敬畏

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虽然无形无象，但却无所不知、无处不在。

当王朝末世或者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难，之前也会有警告，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坛祭天，这都体现出对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国的法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兵法、建筑、乐器等都体现着天的规则，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对“天”，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产党才对“天”斗争。

对天的敬畏维护了人的道德，“人命关天”的观念维护了对生命的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则有效的保护了自然。这些都是共产党杀人和毁坏环境的障碍，而中共却需要依靠杀人来让人在恐惧中臣服于它，需要“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激起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破坏自然的决心。

毛泽东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本来是贬义的“无法无天”变成了褒义的勇敢，并鼓动人参与到“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和环境破坏中。

### 2) 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中国人从对“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观，以及“善恶有报”。

“认命”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被中共解释为面对困境的消极与无可奈何。事实上，“认命”的真正意义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却仍然在 54 岁时辞去鲁国大司寇的职位，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并无消极避世的含义。

在个人的生活中，“认命”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的奋斗，仅仅是对人生中不可抗力解释。更进一步说，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前半生、乃至数世行善或行恶所承受的善报或恶报。因此“命运”也常常与“善恶有报”、“福报”、“恶报”联系起来。

《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观念让人努力行善，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积累功德。“善恶有报”也基于“头上三尺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等观念。

相信命运与报应，让人能够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顺天而行，不会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这种思想更让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对朝代更替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不断留下对后代历史大事的预言，其准确程度令人十分惊奇和赞叹。这种“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也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中共将“命运”与“报应”批判为“封建迷信”，并禁演宣传这类题材的戏剧。其依据为无法证实的“进化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假说。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人恐惧于报应，是绝对不敢一直跟着中共行恶的。

### 3) 批判柔顺与忍让

刘少奇说，“新闻报导要客观、真实、公正。”说得很好，对吧？民主国家的媒体也追求这些目标。可是他接着说，“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否有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利害关系和真实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重呢？再说，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但对人民有害怎么办？

他接着给出了例证。“例如，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在肃反斗争中杀错了一些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报导了，就对当前的斗争很不利，这是立场问题。”

斯大林杀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9 年到 1953 年总共有 1950 万到两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相当于当时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

为了中共的一党利益，两千万条人命可以被漠视，这就是刘少奇的“客观、真实、公正”。当然，这和刘的一贯立场是吻合的。早在 40 年代，他就曾经说过：“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闻机构，一边“反对假新闻”，一边“严把政治关”；一边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边抓捕敢说真话的记者；一边制度性撒谎，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虚伪性”。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共，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 4) 灌输手段“与时俱进”

文革以后，虽然中共发动宣传机器，把其党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说成个别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毕竟“我党一贯正确”的流氓耍不灵了。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引进了许多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宣传手法。

**以真乱假。**如果说 49 年以前，中共的宣传策略是“以假乱真”，把一种没有根基的邪说描绘成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49 年以后，其策略可以被称为“真假成真”——中共强行在城乡各阶层间挑起矛盾，于是其斗争哲学好像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它的策略又调整成了“以真乱假”，把事实掺杂在谎言里，虚虚实实，让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

**小骂大帮忙。**就象反腐败“打苍蝇不打老虎”一样，现在的中共喉舌也暴露一些阴暗面，制造媒体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假相。但对于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黑幕却坚决封杀。一些媒体用报导小来小去的负面新闻积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发动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大打出手。央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节目或以敢于报导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的负面消息或以风格比较新颖取信于民，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比如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就被中共拉到前台，利用其积累的一点人气来造谣污蔑，充当了可耻的舆论打手。

**以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媒体，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一位西方记者在中国做过访问后说，十几年前人们不知道民运人士魏京生，是因为中共把他的名字从信息环境中抹掉了；现在的人们不知道魏京生，是因为娱乐明星的性感迷人。中共一贯“打非”不“扫黄”，浏览中共所谓“门户网站”，就会发现那里充满了下流的色情消息和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有学者做过统计，海外的网站，如果登了色情图片的话，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被过滤掉；如果组一个反对党，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如果要谈“法轮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可能性会被过滤掉；而登了《九评共产党》的网站被过滤掉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多。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子里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

国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少数右派陷入人民群众的重围”,“右派是一小撮败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霎时间“右派分子”感到被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每次中共发动政治运动,都会发动党、政、军、工会、团委、妇联、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宗教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法律界、“各族同胞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乃至普通工人、农民(其实是中共在这些团体内部的代理人)“揭批”、“声讨”、“控诉”,伪造出全民表态支持的假象。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被置于“少数派”的心理劣势之中,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出来,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发起的所谓“百万人签名”,与以往的“伪造大多数”、“伪造民意”的手法如出一辙。

除了“伪造民意”以外,中共的心理战还包括“诉诸权威”的手法。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崇拜权威”的心理,“专家”、“教授”、“学者”的话要比市井小民的话有分量得多,也显得比中共官员的话中立、客观。可是中共统治下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专家,即使有,也走不上中共的媒体。御用“理论家”、“科学家”衣冠楚楚地走上屏幕,把“党”要宣传的内容用学术语言包装得冠冕堂皇。人民大众看不懂“党”和“专家”演的这场双簧,成为党文化宣传的牺牲品。

#### (4) 公开撒谎,蒙骗世界

公开撒谎,这一招也可以算是中共经典,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从唐家璇到李肇星,从张文康到秦刚,中共对这招宝爱有加,屡屡使用。

毛泽东宣称:“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还真的把很多人镇住了。善良的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说话理直气壮的人,其行动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毛的“雄文四卷”里,尽管多的是这种“流氓耍赖、泼妇骂街”的段落,可是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

江泽民以一国元首的身份,当着国际媒体的面污蔑法轮功。没有见识过中共厚黑术的西方记者,怎么能想到一国领袖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呢?

2006年3月9日,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兽行被曝光。3月28日,中共部署已毕,派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指控矢口否认,甚至“邀请”媒体前去调查。这个“障眼法”虽不甚高明,还是颇迷惑了一些人。“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调查员迅速反应,分别到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中共领馆申请去中国调查的签证,三次申请,三次被拒绝。悉尼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不相信秦刚的谎话,对调查员说:“那你就找秦刚要邀请函去!”可见,中共祖传的骗术连自己人也不太相信了。

对在“新闻战线”工作的中共党员来说,撒谎就是他们的职业,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是他们的基本职业素养。他们每天披着“职业人士”的外衣所做的,和毛泽东、江泽民、秦刚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 (5) 贼喊捉贼,一边撒谎,一边反对撒谎

今天的中国人对党八股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觉察其中的矛盾和悖谬之处。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可是,如果群众都不相信党了,我们应当相信谁呢?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易经》以“坤”卦来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顺”之德。这种柔顺并非无原则地逆来顺受,而是顺应天道而行。

“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

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

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

“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记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看到乾为刚、坤为柔,刚柔相济,万物咸亨,由是领悟和谐之道。传统观念中非常重视“和”。皇宫三大殿,分别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对和谐、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发言人现在也常常把“对话”、“协商”、“合作”等等挂在嘴边,这种谎言是镇压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汉源事件、陕北油田事件以及对上访人士、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的残酷镇压,实则为斗争精神的延续,利用屠杀营造“伪和谐社会”。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斗争已经成为中共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寻求对话与和解,中共自身就会解体。

#### 4) 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以及《易经》中“乾坤”与“阴阳”的对应扩展出一套家庭和社会伦理,再从这套伦理中派生出社会秩序。

“尊卑”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统文化,“卑”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为水总是“处下”。“处下”的一方是被爱护和保护的一方,处上的一方则是付出的一方。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但刚强不一定意味着好事,道家有“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的说法。

中共一直打乱秩序,谎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社会不存在中共意义上的平等。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企业、社团或家庭,总要有人负责任去协调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计划,有人具体执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也是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中共将其极端化了,将其描述成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中共要打乱一切尊卑和秩序,这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实为制造“混乱”。

举例来说,倡导男女平等的人也无可否认,在遇到灾祸、疫病、饥荒、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都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如果倡导男女平等,似乎妇女应该和男子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们的丈夫也必须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和轮船一起沉

没。无人对此决定持有异议，这反映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无男女的绝对平等。

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企业或者国家需要有决策者，决策者的决议需要执行者去执行；一支军队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级军官和士兵负责执行命令；如果从社会职能来看，确实存在“尊卑”的问题，但“尊卑”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间的“仁”和“忠”的美德来维系。

推广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传统的伦理自然承载起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

而“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法中的“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无亲”，是儒家的“有教无类”，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绝非结果的平等。

中共对于“平等”的歪曲宣传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对于“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释实则为对妇女的迫害，强迫她们去做力不胜任或者不适合妇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 1976 年 4 月出版的《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书中列出了 15 位女青年的文章，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即为本应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装卸工等，“紧握杀猪刀，能顶半边天”成了歌颂的对象。

中共治下的社会同时也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虽然它号称人民公仆，实际上人民都被当作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官民毫无平等可言。

### 5) 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翻开中国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对这些德行的认可和尊敬。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传数千年，并从汉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和学识是使人获得声望和地位的来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人的人品成为选官的重要指标。汉代的时候实行察举制，荐举标准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另外还要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的美德。至魏晋，官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开科取士，对于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样是应试者能够写出好文章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先决条件。

到了中共建政时，德高望重的乡绅、行会首领和知识分子反而成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根红苗正”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考量。每个人的道德本来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行为，而到了中共那里，道德成为一个阶级的群体性标志。“谁受穷谁光荣，谁致富谁狗熊”，贫穷代表了天然的正确和正义，代表了受压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一个人的贫穷和富贵本来是不定的，也可能因为勤奋肯干和抓住机遇而致富，也可能会因为挥霍而败家。也可能某人田连阡陌，但数年后却讨饭为生。而中共实行“一刀切”，以它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来划分阶级。

对于富贵的仇视，导致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贫穷作为傲视他人的资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时，只需称此人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余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富贵代表了“剥削”，代表了“镇压”，代表了“罪恶”。

几十年后，共产党自己颠倒乾坤，号召大家去发家致富。今天的人们不再以富贵为罪恶，转而以贫穷为可耻。此时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成功与否也和道德脱钩，而以人的富裕程度来衡量，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哪管这钱是偷来、抢来、骗

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

### 3) 常用的灌输手法

#### (1) 铺天盖地，让人和真实世界彻底绝缘

美国影片《真人活剧》（一译《楚门的世界》）的主人公楚门生活在一个精心构建的虚假世界，这个世界是一部肥皂剧的场景，而肥皂剧的剧情就是楚门二十四小时的生活。这个虚假的剧中世界包括一切真实世界的元素，而楚门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因此直到长大成人，他都没能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在政治学术语里，中共这种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的政权被称为“全权式政权”。这种全权式政权能够维持存在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利于该政权的虚假信息环境。中共深谙此道，多年来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虚假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和真实的世界彻底绝缘，失去了据以判断真伪、善恶的参照系统。可以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都生活在“楚门式”的虚假世界里。

中共也可以在短时间迅速制造一个虚假的信息环境，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99 年 7 月 20 日以后，中共开动宣传机器栽赃抹黑法轮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中共报刊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陷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多达三十余万篇。其他宣传工具同样开足马力，广播、电视、舞台、课堂、各种会议、集会、墙报、标语，除非你闭目塞听，否则绝没有可能逃脱中共的洗脑宣传。

#### (2) 不断重复，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老三篇，天天读。”文革时期“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现在则有“统一口径”、“转发新华社通稿”。中共谎言经过千百遍的重复，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他们还以为这些观念是自己思考得来的。

宣传和重复往往招致反感和讽刺。可是，中共并不害怕人们的反感和讽刺。持续使用这种看似初级的灌输手段，让人产生“中共骗术，不过如此，何必小题大做，与它一般见识”的心理。那些敢于嘲讽中共的人，一定自视老练通达，不轻信，有主见。可是，通过重复，中共的词汇、概念、标语口号和思维方式，被强力压进人的潜意识里，替代了人自发的情感和判断。只要你还在用这种词汇、概念思考，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党”允许你得出的结论。只要你把民运人士称为“民运分子”，你对他们就决不会有好感；只要你还在用着“解放”、“新中国”这类词，你对中共总有点儿感恩戴德；只要你还把中共亲昵地简称为“党”，你就承认了这个恶党盘踞中国自然而然、合理合法；只要你还把文革叫作“浩劫”，你就是在接受中共暗示，相信造成文革灾难的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忽略了文革和中共暴政的必然联系；只要你还在把失业工人称为“下岗工人”，你就是自愿配合中共的宣传策略，暗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存在下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才会失业，失业总是和破产、流浪、饥饿、自杀联系在一起，下岗却总有重新上岗的一天。

听听中国人说的话，看看遍布中文网络论坛的愤青们的原教旨党语言，就会知道中共的重复灌输多么有效。

#### (3) 伪造民意、诉诸权威，发动心理攻势

中共剥夺了人民的真实声音以后，进而宣称自己是最大多数的民意的代表，从而占据宣传制高点，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强迫人民接受它灌输的歪理和谎言。1957 年反右运动中，充斥报纸杂志的都是这种标题：“工人阶级说话了”，“全

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

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的遵循如下模式：前二十五分钟的节目无例外地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看，其实这五分钟也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

专题节目（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如《实话实说》）、电视剧（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敢言”声誉鹊起，可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子，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找细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也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我解嘲说，“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说穿了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就是腐败的都是副职、下级，虽然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但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正职、贪官的上级等等，就象西方戏剧美学里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给“党”挽回了面子。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副职和底层官员，如果说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那么党国大员、太子党对国库才是“鲸吞”。即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还是让观众深深沉醉在对“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场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在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者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把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把所有人都描写成无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2004年中国大陆共发生七万四千起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源农民抗争发生大规模流血、爱滋病村惨状触目惊心、黄河源头断流、淮河严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矿难频发、天灾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的“春晚”被命名为“盛世大联欢”，真应了一句流行的话：“把欺骗进行到底！”

由于互联网上站点众多，不利于中共“主动出击”式地灌输党文化，所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主要策略是“封堵”，不让中共禁止的言论流传开来。中共监控网络的主要方式包括：封锁海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抓捕网络作家、过滤电子邮件、布置网警、网特等。这方面最有名的举措是于1998年立项、计划于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资八亿美元的所谓“金盾工程”。这项工程名义上是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网络封锁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到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

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给了很多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觉。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共让他们看到的；中共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他们一概看不到。谎言

来、贪污受贿来的、出卖肉体来的或者出卖灵魂来的。“笑贫不笑娼”的结果是让大家更加不择手段地捞取财富，之后便沉迷声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认同中共的统治。

### 6) 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将思想批判转变成人身攻击。然后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歪理邪说将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骂倒。而对于思想者的人身攻击，也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扣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过诋毁孔子，随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内涵，而是高分贝的广播、铺天盖地的大帽子、大字报，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惨下场，从而出于恐惧而自觉与这些思想“划清界限”。

儒家讲“仁”，就是要关怀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仁”的批判导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和稀泥”、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须臾离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义，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犬儒。

### 3. 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

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象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子，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



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象，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 1) 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

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负责宣传的猪）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地，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揪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 4 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教活动”等等。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也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谁是人民，谁是反动派？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

“舆论一律”，“新闻报导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说“亩产三十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说“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只有日期是真实的，可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把中共操控的大小媒体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编程度大小而已。

八十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可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抓在手里。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象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把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叫以前的名字，可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做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灼烧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 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在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报纸还在竞相夸口又创高产，循循诱导人们吃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 年春北京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 (2) 广播、电视、互联网

除了紧紧抓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 年 5 月公布的数字，2002 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 306 家，电视台 360 家，广播电视台 1300 家。广播人口覆盖率 93.2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4.54%。据调查，十五岁到六十四岁的城市居民中近 90%每天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报纸杂志。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降，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 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抓



安全感来维护其党的稳定。和谐、反腐、爱国、小康、五个一、三代表、八荣八耻、学习、加强、成绩、高举、里程碑、先进性、阔步前进、伟大胜利……铺天盖地的党文化造假宣传，把民众和中国的真正现实几乎全面隔绝开来。失业工人和进城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被强制拆迁而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迅速下滑的道德状况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这些严重威胁民族生存的可怕现实，或者被完全挡在人民的视野之外，或者被刻意淡化，美其名曰“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

自由信息是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来源。中宣部的各种禁令和设限导致信息完全被中共过滤，民众无法从中得到真实的消息，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人们不得不时时吸食被中共党文化浸泡的信息，顺着党文化的思路进行反应和批判。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灌输习以为常，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党文化洗脑了。

## 2) 主要的宣传机器

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也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愈加紧密地和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进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也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也保障个人或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并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那么他也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

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

### (1) 报刊

据 1991 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1949 年以前，全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国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一千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

可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里，如果这时再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务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它，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 300 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 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 50 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後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六十四卦，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易经·乾卦》）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复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易经》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易经》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给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把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正因为如此，嗜血好斗的党文化，也是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

## 2) 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从此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清末行乞办学的武训尽管一生受尽屈辱、节衣缩食只为兴办义学，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语），“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

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所谓“启发阶级觉悟”，所谓“培养阶级感情”，实际上就是灌输斗争思想、宣传仇恨，在过去中共毫不隐讳的宣传：“血债要用血来偿”，“仇恨入心要发芽”，“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仇”。随着国门的开放，这种在文明社会被普遍唾弃的仇恨宣传不能再明目张胆的进行了。虽然中共不再搞“痛说家史”，“忆苦思甜”，但这并不意味中共放弃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变了面目，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了精致的包装。比如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指出中共反复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目的就是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在中共历史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疯狂宣传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民运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觉悟”就体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上，学习雷锋精神，要对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叫做“阶级感情”，它超越于人类一切感情。毛泽东讲：“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的这一讲话文革中在“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阶级感情，刘少奇既然反对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她就“活该”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

不知不觉、心甘情愿、甚至乐此不疲的程度。

（2）常规时期的灌输由中宣部统筹实施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具有正面的意义。遍寻往古来今的政治体系，也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政权体系当中，才有“宣传部”的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出于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需要，把宣传部的英文名称改为“公共信息部”（Publicity Department），但其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宣部，是中共对中国媒体和全民精神控制的专门机构。

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把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中共通过中宣部掌控全中国的舆论导向，贯彻传达“党”的意志，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反复洗脑宣传，把全民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意图上来。中国的两千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上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几十万个网站，均由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负责管理。

众所周知，中宣部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意志，以中共的集团生存为目标，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中宣部的工作，说来简单，那就是一面封杀真实，一面制造虚假以取代真实。

我们首先看看中宣部是如何封杀真实的。2002年6月中宣部下发给新闻媒体的一道禁令，共列举了三十五个“不许”，下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许擅自报导农村税费改革”，“不许对重大疫情、病情进行渲染报导转载”，“不许对重大安全事故随意报导”，“不许报导私营企业主入党”，“不许报导和转载状告各级党委的政府事件”、“不许过度渲染贫困和暴富分红”，“不许报导希望工程存在的问题”，“不许在媒体运用‘封杀’一词”，“不许提新闻舆论是第四种力量或权力”、“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不许集中进行批评性和负面报导”，“不许对民族宗教等领域进行随意报导”，……

中宣部每年向各省市自治区传媒下发至少一百多条（次）通知或禁令。省、市一级宣传部每年平均向媒体发出的通知、禁令超过二百三十条（次），其中发禁令最多的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河南，这些省市的宣传部每年向辖内各媒体发出的各种禁令通知书超出三百一十条（次）。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媒体几乎每天收到一条禁令。

为加强对传媒的控制，中宣部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监控中央和地方主要传媒的动向，并定期向上报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或新闻局聘用大批“新闻审读员”，专门负责监控传媒文章、音像制品等的“政治问题”。由中宣部新闻局负责审读的出版物仅报纸类就达一百余份。

可能有人会说，以中国之大，除了这些禁忌话题以外，可供报导的事件还有很多。可是，中共惯于“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朝颁夕改，无限上纲，所有党不喜欢的言论都可能被贴上“错误”的标签。这些禁令正因为措辞模糊、没有规律可循（“不许随意评点……”、“不许过度吹捧……”、“不许刊发错误言论和不正确观点”），所以具有更大的威慑作用。媒体从业人员唯恐触犯雷区，于是只好自我设限、宁左勿右，每个人都充当自己的新闻检查员。那些有幸通过检查的新闻，已经“政治正确”得几乎没有任何阅读价值了。

中宣部同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另一种“真实”，通过给百姓虚幻的满足感和

化大革命中，中宣部曾被称为“阎王殿”受到冲击，全国范围内表面上一度出现“无政府”、“天下大乱”的景象，但掌握实际权力的中共核心集团从未放松对重要的宣传机器（如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控制。

在常规时期，中共的宣传灌输遵循如下模式：党魁定调—政治局决议—中宣部贯彻—各级职能部门和喉舌执行。而在危机时期，中共党魁往往绕开一般性的程序，一手操控媒体，一手紧握屠刀（军队、警察、特务系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过后则以“党性”要挟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于是党性一次次战胜人性、一步步灭绝人性，直至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都屈服在“党”的变态意志之下。

毛、邓、江分别在不同时期，跳到前台，直接捉刀或授意喉舌报刊发表社论，为政治运动定调。1957 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以后，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开始了对数百万知识分子的严厉整肃，这场被毛称为“阳谋”的“反右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为 1989 年学生运动定性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是在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直接授意下出笼的。1999 年 10 月 25 日，中共恶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将法轮功称为×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教》，江泽民失去理智的咒骂从此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的宣传灌输往往伴随着狂热的政治动员和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这种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切断了人的正常信息来源，使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很多人由此接受中共舆论的“引导”，并以为那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即使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面对中共暴力机器和“群众专政”的巨大压力，常常也只能保持沉默。

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觉得中共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荒谬可笑。可是，如果从灌输党文化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运动非常“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这是因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灌输，人们无法正确分辨哪些是自己的正常思想，哪些是中共灌输的观念。人们“告别革命”，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世“真理”，敬天信神被称为“封建迷信”，被抽去了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或者被当成装点门面的饰物、或者被当成赚取钞票的工具，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中共的“思想改造”成功了。

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中共被迫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作出些许让步。但在关系到中共集团生存目标的意识形态领域，它从来没有放松过。邓小平曾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就在 2005 年，提起被封闭得象高压锅一般的共产流氓小国古巴和北韩，胡锦涛还羡慕不已，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一贯是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一方面继续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不得不“与时俱进”，变换花招，其宣传策略变得更精致、更灵活、更有欺骗性了。虽然从 80 年代到现在，中共又接连发动了“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六四民主运动”、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的运动，可是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身处政治运动之中，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已经达到了让被灌者

北京“红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过的学生亲手打死的老师，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教学生们“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时候，告诉学生对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的时候，埋下了自己灭顶的种子。

在群众批斗场合，人人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说明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

被中共禁演的电影《蓝风筝》里有这样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情节：反右开始了。主人公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单位摊上了一个右派指标，大伙不得不讨论决定这顶帽子该给谁戴上，完不成指标就别想散会。但少龙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身离场——他要去上厕所，在那一刻，也许他认为上厕所比开会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门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推举”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已经练就了完全越过道德底线，践踏别人、保全自己的厚黑术，那么今天在同样“你死我活”的商战中，腐败贪污、假冒伪劣、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等等行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其中的哲学依据都是一样的，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极权统治。

### 3) 回归和谐相处之道

2005 年“狼文化”风靡全国。跟风“狼文化”的一本书，《狼魂》中说：“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可以说是深得党文化斗争思想之精髓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与上述思想作为对比。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友好态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

在消灭敌人吗？”

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唐初突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雪父耻，反而极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担任五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历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经是一个剽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地区仍不安定，战争还会再起。正是唐朝对突厥的宽容政策、对回纥、粟末靺鞨、南诏等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及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四夷宾服，诸国来朝，即使远如波斯、昭武九姓国、于阗国等等都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气象。

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我们的祖先赋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的神圣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赖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实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 5 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历经各种灾难，但它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毕竟已将它们凝聚、融合而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满族如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

党文化不但在纵向割断了中华民族祖辈承传的智慧，同时也在横向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优秀文明。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国人只能相信党文化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恩格斯），“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马克思）。中国人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历史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不少，但用枪杆子对付本国的百姓以维持政权，并最终使得民众彼此内斗，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这恐怕是中共的“独创”了。

尽管中共今天也提出来所谓“和谐社会”，但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希望社会底层民众不要再上访、不再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合法抗争，希望民众不要对中共的腐败而发出批评意见，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党文化包装下的所谓“和谐”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的需要，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截然不同。

事实上，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矛盾，往往最终付出的社会成本大于收益。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矛盾的双方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还可以表现为共生关系、和谐关系，而斗争关系是最有破坏性的一种。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并未用一枪一炮，却争取到了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改变了美国历史；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了印度民族的独立，为人类留下了很好的典范。

美国受到 911 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

## 第三章 灌输手段

文化是一个人群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可是中共攫取政权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给中国人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模式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制造了一个遍及中国一切方面、一切角落的党文化。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也就是说，一个受传统文化滋养长大的人，不可能自动地具有共产党所宣扬的变异观点。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

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中共视宣传灌输为自己的生命线，几十年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繁复的制度、精致的技术和大量的“人才”，再辅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强化。其主要手段包括：紧紧抓住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造假宣传；强制人民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控制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用学生的教科书歌功恶党，让人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泡在党文化中；利用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等等。这种灌输是如此系统，如此精致，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被灌输、被洗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思维都与中共的灌输密切相关。

系统反思中共集大成的灌输手段有助于我们认清党文化的建立过程、本质特点和画皮千变的内在机制，深入剖析中共的灌输手段是解体党文化的重要一步。

### 1. 紧抓宣传机器推行党文化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共产党的两大生命线，列宁曾经把这种斗争手段概括为“恐怖主义”加上“意识形态”。中共继承了苏共的邪恶基因，把“骗”字诀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刘少奇在 1951 年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全党做宣传的。……以后，更要这样做。”中共的宣传机器在中共对民众进行洗脑灌输、建立党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1) 政治运动与常规时期

##### （1）在政治运动中灌输

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是中共政权与正常的人类政权最大的区别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和人性截然对立的，一旦环境宽松、控制减弱、与外部正常社会接触增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出现人性复苏的情况，中共则面临着“党心”涣散、难以维持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也就成为必然。

因此，中共利用宣传机器灌输党文化也可以分政治运动和常规时期两种情况。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中共的核心领导层都把控制宣传机器（报刊、广播、电视等）当作“头等大事”、“重中之重”，只不过具体操作方式略有不同。文



不夸张地说：可卡因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 $E=MC^2$ ）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不能由科学本身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除了传统宗教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他说“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在此，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由于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

尽管普通民众，特别是许多受中共党文化灌输而相信现代科学无所不能的大众，尚不能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许多清醒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一封有1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信送到了大会，引起反响。信中说：“人类与自然已经处于强烈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导致了环境和关键资源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经常是不可再恢复。如若不进行检讨，我们的许多活动将把我们所希望的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王国的将来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且可能把这个生命世界变成不能维持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为了避免将要到来的冲突，本质上改变（人类活动）已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指责现代科学。在这里指出现代科学的局限，是为了澄清党文化造成的误区，揭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灌输无神论，最终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

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从天地、神明和人的关系而确立的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恶报应、讲求顺应天道、返本归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共高举“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这些的核心价值一概贬为“封建糟粕”，同时通过灌输未经证实的进化论和灌输片面化、宗教化的现代实证科学为手段，以残酷的政治斗争为暴力依托，而达到其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目的。虽然今天的中共出于装点门面也不得不表现出推崇传统文化的样子，但因为其无神论的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对神的信仰几乎已成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无论其装修多少庙宇、建立多少“孔子学院”、提出多少诸如“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之类动听的口号，中华文化的神韵早已被中共抹杀。这种失去了内核价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强行用“无神论”改造人们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传统文化几乎被中共连根拔起，以至于今天的社会秩序仅仅是靠着老年人遗留下来的一点传统道德观念维持着，而缺乏信仰的道德与文化显得如此苍白和弱不禁风，随时会被横流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纵欲主义所彻底湮灭。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善恶有报的信仰被贬得一钱不值的时候，人们不再探寻生命的价值，也无须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们心中没有任何顾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当下”的“潇洒”、感官的满足和对欲望的无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结果，使中国人的心灵没有了归宿，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立命的根基。

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二十三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三十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美国人这种爱国方式，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在中共党文化熏陶下，许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已经和“仇恨”画上了等号。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不论仇日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来源。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许优势就来源于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兼容并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摒弃“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回归和谐相处之道，这才是民族强大的精神之源。

#### 4. 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 1) 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六亿年前至二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一八四四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Inchyra的Kindgoodie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沙石岩中，居然有一枚钉子的一半埋在里面。这枚钉子虽已被腐蚀了，但仍然能辨别出来。1985年，这块沙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四千万年历史。那么是谁在古老岩层里留下的钉子呢？

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1万年左右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在另一项由美国裴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5年7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

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与中共党文化的思维定势相反，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恰恰与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 1949 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众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的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又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支持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的观点。”恩格斯也说，“（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的无产阶级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

人类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后，就一直在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永恒的根本问题。在消灭各种宗教信仰之后，进化论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够用来解释生命起源的学说。在网上做一个搜索，往往会发现许多中学教师对于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一章这样分析：“对于学生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共在铲除中国敬畏天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强行灌输。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都会不假思索的声称，“我是信仰无神论的，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抛开无神论、进化论本身的是非对错之争不谈，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灵的选择，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强权之下，谁不信仰“无神论”，谁不信进化论就面临着“封建迷信”、“愚昧”、“误国误民”、“反科学”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临着被划离“广大人民群众”而成为“一小撮”另类的“改造对象”。在这种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自由抉择的权利，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2)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假说，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然而随着科学深入广泛的发展，大量的事实发现对进化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脆弱的逻辑基础

许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现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初中生物教学资源”中这样写道，“在人类，偶尔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要按这种逻辑，婴儿无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

中国古代科技并没有走上西方实证科学的路，但能不能据此而将其视为荒谬呢？由前面的假设中我们不难想到，华夏祖先数千年来留下的文化遗产中那许许多多被视为“迷信”的部分中，一定也有现代科学所不能认识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医发现了经络、发明了针灸，如今现代科学已经采用测量皮肤电阻等方法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中医的作用也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人体经络、穴位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特征，只体现在活人身上，经络运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响，而且几乎没有解剖结构特征。按照实证科学之路，采用西医的解剖方法，是根本无法发现的。特别是古人还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发现了穴位开合与能量流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此应用于临床治疗可获得显著的疗效，这更是以解剖为基础的西医难望其项背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是通过打坐修炼而体察到经络的运行的，明代李时珍在其所著《奇经八脉考》中就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中国古代科学讲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质身体、人的精神和整个宇宙视为有机的一体，直接进行整体研究的。

很显然，一旦需要把人类本身的精神活动也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体环境时，实证科学所要求的重复试验过程、分解还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适用。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抡起实证科学的大棒子打击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实际上恰恰是被党文化一叶障目，把现代科学宗教化、权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8) 实证科学的局限

由于现代科学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采用僵化的思维方式来灌输现代科学，以至于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而“不科学”的也就成了谬误的代名词。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广义上讲，科学是探索和不断接近宇宙规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认识和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识体系，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科学并不等同于终极真理，它应当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事实检验，并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现代实证科学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现代科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逐渐给人类带来许多头疼的难题。一批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了。来自西方的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与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与物分割开来。其后果就是不能实证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道德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体，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人主导的科学发展却有着很大的盲目性。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谁也没想到 200 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杀虫剂 DDT 的人工合成，曾被认为是人类之福，因为它能使作物免于虫害，然而人们没料想到的是，若干年后虫子产生了抗药性，而人类的食物中却发现了 DDT，更让人惊恐的是青少年体内、甚至母亲的乳汁中也发现了 DDT；可卡因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因为发现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从无影灯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我们甚至可以毫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典物理学巨匠牛顿。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共无法掩盖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于是在教科书中刻意把牛顿说成是晚年涉身宗教，并因此无所创造，误导人以为其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无神论”的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然而事实是，牛顿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远早于其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更经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因此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以至于后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其所著的《牛顿传》中都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 1977 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统计材料，自从 1901 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 286 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曾说“许多科学家确实既相信科学，也相信上帝——启示的上帝，而两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现代航天科学之父冯·布劳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作对费曼的注解：“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7) 实证科学并不是探索宇宙规律的唯一方式

1994 年 3 月 1 日，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二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 8 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 8 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 19 把青铜剑，剑剑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 2000 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 10 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 1937 年，美国在 1950 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无独有偶，在考古人员清理秦皇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高达 150 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 45 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 2000 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形状记忆合金”目前用途很广，连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记形罩杯”，可是有谁想到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科技文明，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 200 多年以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述神奇的铸造技术并没有留下实物而是记载在中国古籍之中的，并且我们是在上世纪初现代人类尚未发明类似技术的情况下发现这些古籍的记载的。按照中共党文化所谓“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现代人都不能实现的技术出现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艺术想象”。同时御用“反伪”、“打假”的打手们也一定会引经据典，论证其荒谬。

实际上，这正是中共长期灌输现代科学，致使人们而把现代实证科学奉为唯一真理的僵化思维表现。受这种思维影响的人，对现代科学尚未探索的领域、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伪科学”、“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不予深究，也是因为深究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许多人听到这话感到很惊讶。其实，问题的揭示会使人更惊讶。

比较解剖学证据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按照比较解剖学，哺乳类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鳍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结构，因此达尔文推断它们从同一远祖遗传而来，只是进化过程中因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显然，用比较解剖学证据来论证进化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从同一祖先的假设，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四肢骨骼结构相似的结论，但反过来却不一定。正如冰箱制冷可以使水结冰，不等于水结冰一定是由于冰箱制冷。

古生物化石也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进化论支持者以古生物化石论证其进化的过程，却又需要依赖于进化的模式。比如中国著名猿人“元谋人”的确定，是从仅有的 3 颗人类牙齿推断来的；蓝田猿人的确定，仅凭一个下颌骨；丁村人，三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把它们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模式。这里边暴露了一个逻辑问题：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是循环论证。所谓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发现，就充分暴露出这种论证逻辑的缺陷。一九二二年，生物学家奥斯本宣布发现了一颗牙齿，这颗牙齿同时具备猩猩、猿人及类人猿特征。他给这颗牙齿的主人取了一个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着，相信进化论的人士画出了这个猿人的想象图，仅仅凭着一颗牙齿。但一九二七年，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颗牙齿的主人是一种绝种了的美洲野猪！

那么进化论是归纳法吗？不是，太多事实归纳不进去。

有人曾说进化论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思路稍微难一些，其实也好理解。归纳法就是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能把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归纳进去，那这个命题就是真理。然而对于进化论，太多的事实归纳不进去。从前面的史前文明证据来看，从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的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许许多多不但归纳不进去，而且都在否定进化论，可见进化论的论证作为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还是循环论证。

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了整个进化论，人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然而当我们严格的分析起来，都会大吃一惊。

中学生物课本上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 Bodleian 图书馆，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纪德国 Jena 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从这张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动物成年后形态各不相同，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包括人类，各种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某个阶段，其形态会重演一个类似鱼的形态，表明它们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动物，它们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就是支持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胚胎重演律”。

其实，用重演律证明进化论，也可形式地表述为：“假如进化论成立，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观察发现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成立。”逻辑上讲，这仍然是用假说证明假说的“循环论证”。

1997 年，英国科学家理察逊和多家实验室合作，收集更多种系的动物，观察它们在各个胚胎发育期的形态。他们发现海克尔的图谱不是基于事实的描述，“我们的研究严重削弱了海克尔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尔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固定程序设计的胚胎。”权威的《科学》杂志于 1997 年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综述（Science 1997, 277:5331）。

那么，为什么海克尔和理察逊的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尔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相近的动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蝾螈代表两栖类，而不用青蛙，因为蝾螈本身更象鱼。又如早期鸡的胚胎其眼球是没有色素的，但海克尔把它涂黑，使得鸡的胚胎和其他动物胚胎更相似。海克尔特别对人的胚胎图作了艺术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内脏部分和腿，就成了一个有尾巴，类似鱼的胚胎。

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在理论上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现在公认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因。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

### （2）概率计算否定了进化论的核心——基因突变机制

达尔文时代，近代西方科学正处于奠基阶段，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很肤浅。那时的人看到了家养动物的诸多杂种变异，就认为物种也能这样变成其他种，这就是进化。后来，随着基因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学者们才意识到如果基因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不管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然而基因又是极其稳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变”才能使之发生改变，那么“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了。这是现代所有的进化论者公认的。这里，我们就集中分析这个核心理论。

#### 物种基因的稳定性极难逾越

基因的稳定性是物种保持自身稳定所必需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并不能使此物种变成其他物种。动植物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称之为基因体内平衡。最常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这说明进化论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在理论上，人们把突破这个障碍的可能性寄望于基因突变，这是唯一的可能了。

#### 理论和实际上，基因突变产生高级性状的机率几乎是零

基因突变，是一种在基因复制或修复损伤等过程中发生的随机错误，所以又叫随机突变，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它发生的机率非常低，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等原核生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

基因突变能否产生具有生存优势的高级特征（性状）呢？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碱基排列而成，如同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程序吗？当然不能。基因突变也是这样，单个碱基的变化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

####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绝对不可能的程度

现代进化论以基因突变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变本质上是一种随机错误，因此概括地讲所谓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有一部分古猿在数百万年里，因为一系列的基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突变，“恰好”使得古猿前额逐渐增高，眉骨变小，吻部后缩，脑容量增大，脊椎变直……最终成为现代人类。

很显然，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能决定最终哪些物种存留下来，却不会增加整个过程发生的概率。许多学者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这样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要想每一步都发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TPA）产生的机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经过计算至少需要一百亿年才能

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对量子力学一些理论的批判、对相对论的批判、对控制论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论被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大爆炸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是“学术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是“供给宗教和科学以新的论证”的伪科学，等等。

中共几十年来杀人、搞运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学”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却恰恰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歪理邪说。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

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围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人类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远远不足，共产党却把马克思 100 多年前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从的态度。

#### 6）科学家信神并不妨碍其作出科研成就

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什么美国科学这么发达，还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这是中共党魁本身的愚昧无知的典型代表。其实，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一问中共，中共动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输现代科学、宣传所谓“科学无神论”几十年，为什么堂堂 13 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海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反而恰恰都没有经历过中共的灌输？其实这正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科技，其实质是为了压制信仰，钳制思想自由，而科学创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共的灌输方式，却极力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在民众头脑中形成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以为对神的信仰必定导致“愚昧”、导致“反科学”，把宗教信徒都描绘为一群没有多少文化而寻求心灵安慰的受骗者。

事实上，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均称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神的杰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科学研究和个人对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产党所宣扬的水火不容的关系。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大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比如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的开创者波义耳、电解原理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热功当量的发现者之一焦耳、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韦、被誉为原子理论之父的道尔顿、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青霉素的发明者弗来明、微生物学的创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行仍然不断。2003 年全球流行的萨斯（SARS），2002 年 11 月最先在中国广东省爆发，但当时中共内部正面临党魁江泽民 16 大退位问题的争执，为了政权稳定而将疫情瞒下，最后错过春运前控制疫情扩散的机会，导致 SARS 全球爆发。这里哪有一点科学态度的影子？

几十年来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狂热的政治目标做出无数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最后遭殃的却都是中国百姓。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中共导演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学决策”表演。1986 年，中共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以期通过这一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共驾驭自然的能力，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作注解。于是反对工程上马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有意没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将造成的危害。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中共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即将结束时，正赶上 1989 年 64 事件，有的三峡工程反对人士被牵连入狱，另一些反对派也因而受到压制。当时生态环境论证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此外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科学院三峡领导小组办公室，也有一批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当然不为中共所喜，于是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于 1990 年 7 月 6 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模棱两可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以原生态环境论证组的报告的大纲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的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定了该报告。短短的 6 个月后，在重新编写的报告中，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1991 年 3 月，中共党魁江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1991 年底和 1992 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

2000 年 5 月 17 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一再叮嘱三建委办公室主任“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内外专家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就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在工程上马后的 2000 年却发现三峡库区污染造成严重问题，曾建议拨款治理，他估计需 3000 亿元人民币（《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总投资是 1800 亿元。由于工程问题太多，以至于后来中共没人愿意承担责任，2006 年 5 月这个跨世纪大工程竣工，现任中共领导人竟无人出席典礼。

在中共那里，“科学”和“科学家”都不过是听从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践踏；需要的时候又成了打击异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讲真话、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如黄万里，在中共治下却只能抱憾终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于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学家”，如前面的讲的潘家铮、张光斗等，都因为“听话”而得到重用。当中共需要“科学界”支持镇压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时候，两人又都摇身变成了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

中宣部有个科学处，主管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今天中共的“反伪科学”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是该处的一员“大将”。上个世纪中宣部科学处发起所谓批判“伪科学”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例如：对摩根基因学说的批判、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

发生（目前科学家认为太阳系的年龄约为 50 亿年）。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机率就是十分之一的三十六次方。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时间等待。”

对于生命的产生，现代进化论认为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认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碰撞而成复杂的生命大分子，各种复杂的大分子进一步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读到这么多串连的“理想化”过程，读者恐怕会考虑其中的机率问题了，英国科学家霍伊尔曾表示：“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来装配七四七喷射机一样。”

### （3）进化论的尴尬——关于进化时间表的种种疑问

根据进化论的概念，人类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从两栖生物、爬行类、哺乳类，最后进化到猿，再下到地上进化成人类，中间的过程经历了几亿年。生物学家按照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画出了进化时间表。

然而许多考古学家的发现都直接地反驳了进化论支持者的论点，这包括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远古不同时期的人类的直接证据，从几万年前至几亿年前的人类脚印到人体的骨骼化石，都无法被归纳到进化时间表。例如，据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地质矿产报》报导，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上面发现有四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岩石已有二亿三千五百万年的历史；一八五一年的六月号《科学美国人》刊载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马萨诸塞州道契斯特（Dorchester）进行的爆破中，一个金属花瓶因被炸成两半而飞出岩石。将炸裂的两半合而为一后，拼成了一个钟形花瓶，花瓶由锌银合金制成，它自地下 15 英尺处破石而出，据估计有十万年历史。

就考古学发现而言，令进化论者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进化过程中确凿的过渡类型，严格地讲并没有发现。例如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化石，归类为“古猿”、“类人猿”、“猿人”、“智人”，唯独没有“类猿人”。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被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 1892 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 40 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 1984 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同样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南方古猿，和人无关。

假如进化论是真的，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想一想：从宏观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

观察、假设、验证的“三步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完成了前两步；然而经过几代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步——“验证”，迄今尚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并且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论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论走完这三步曲中的最后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 3) 灌输进化论的后果

中共灌输进化论和其推行无神论的目标是一致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自然界随机产生的。人的产生无目的，存在也无目的。这样，一切对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了。并且，人不过是进化了的猿，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动物和植物，生物与非生物，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

看法，生命也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确，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一只狗，杀掉一只猴子与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

2003 年 3 月，SARS 蔓延到香港。香港媒体连续报导疫情发展。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共前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责怪说：“香港的报纸连续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头版报导肺炎事件，谁还敢来？”“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这种对生命极度漠视的心态，不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 8 千万。然而许多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这种漠视生命的心态，和中共灌输进化论不无关系。

中共不断灌输进化论的另一个恶果，是使人们觉得“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法则。这样，在“国家”、“民族”这样美丽的口号下，对弱势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辩辞：为了所谓的“发展”、为了所谓的“稳定”就无法避免牺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豪言，便有了邓小平 64 时“杀 20 万，保 20 年稳定”的壮语。当这种法则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人心对社会公义就失去了期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

#### 4) 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

自刚刚建政开始，中共就在全中国范围不断开展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近几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学”的口号。几十年来学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确保课本知识只能成为中共的“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佐证，而不会发生冲突。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的“科技馆”、“科普站”，其重要任务之一是配合“中央”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举行“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展览等等。几十年的灌输，使大多数人头脑中不但牢固树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学”、“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选择问题，而是祸国误民，甚至应当全民共诛的“罪行”。

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从来没有用科学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学里，学生有充分的自由组织各种信仰团体，政府和校方不但不会干涉，反而鼓励多元文化的繁荣。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动，但与扫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等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往往是普及灾难逃生常识等等，如从幼稚园、小学生开始就设有灾难逃生等课程，经常演习训练个人在火灾、飓风、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学大纲中没有这些内容，甚至在灾害频发的地区，这些内容也不是当地的科技馆、科普站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本来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学”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各种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学”，扣上导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这样铲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学“卫道士”的外衣，甚至于还可以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迷信”会导致国家“落后”。

中共建政之初，1950 年开始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

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 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1999 年中共开始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也是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为其撑腰，以“反邪教”的名义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之后，又进一步对其他气功门派、地下教会进行镇压。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党”。究其根本原因，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共独裁政权的确容不得民间对神的信仰，容不得在“党中央”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神。

虽然中共通过灌输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来确立其理论根本——无神论，甚至还造了一个唬人耳目的词语叫“科学无神论”。然而就科学发展本身而言，它并没有证实无神论。按照正统宗教的观点，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企图否认人的存在一样是徒劳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讲，对于无神论的证实，必须要求在整个宇宙所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否认神的存在，这当然包括人类远未认识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样、复杂，谁能保证，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只有人是高级生命呢？甚至谁能保证，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赖于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形式呢？进一步讲，现代宇宙学认为人类无法观测的暗物质占宇宙的 2/3，就是说即便穷尽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尚有 2/3 的宇宙属于未知；现代理论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不仅仅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三维空间，认为许许多多空间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层超空间上。就是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空间。那么谁能保证另外的空间没有高级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间存在高级生命，如果他们具备远远超越人类的大慈悲，具备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对人类而言他们不就是佛、道、神么？因而不论从逻辑上和技术上讲，从科学的角度证实无神论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无神论”。作为个人而言，信神与不信神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自由选择。在正常的社会里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当政府以强制手段在全社会灌输无神论，压制对神的信仰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必然会使原有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丧失依托，从而导致全社会滑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的泥沼。

#### 5) 中共不讲“科学”，马克思主义反自然

尽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卫道士，而且还特别豢养一批御用的“反伪科学”专家，“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由政府出资大力宣传，其高调甚至超过科学发达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掩盖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质。

2006 年是唐山大地震 30 周年，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 1 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悄悄下令封杀。因为书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

然而当时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得到国家地震局一位技术人员关于震情的预测通报，并将震情通知到县里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仅 115 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 1976 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这一奇迹作为特别案例被联合国公众管理和灾害科学全球整合计划记录下来。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挂帅，违背自然规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财产的罪